

沧桑看
云书系

摇荡的秋千

李辉 编著

海天出版社

是是非非说周扬



摇荡的秋千

是是非非说周扬

李辉 编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 李辉编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8

(沧桑看云书系)

ISBN 7-80615-803-0

I. 摇…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策划编辑 旷 昕

责任编辑 于志斌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王 颖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广东潮阳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38(千)
版 次 1998年7月第1版
印 次 1998年9月第2次
印 数 6001册—9000册
定 价 16.50元

□李 辉

《沧桑看云书系》总序

几年前，在《收获》杂志的热情相邀和鼓励下，我开设了个人专栏“沧桑看云”。

我很难将这些专栏文章归于哪一类。散文也好，随笔也好，小型人物传记和特写也好，似乎都可以沾上边。对于我来讲，它们属于哪一种类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尽力做到既能勾画真实历史与人物，又能充分表达出自己“沧桑看云”时的心情。

在“沧桑看云”系列开始发表时，我在“题记”中写道：

朋友们常常奇怪我怎么净爱写些陈年往事。

我说我在往昔中看到现实的影子。失却历史沧桑感，现实多少会显得苍白、轻

飘荡的
秋千



飘。

现实每天都在成为过去。

我们自己本身同样在写着一部历史。

我乐意把笔浸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注视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

悠悠沧桑之中，一切人或事，都是飘动的云。它们相互映衬，方显出历史的复杂和丰富。

于是，我在看云。

其实，每个人都在看云。

几年过去了，心情依旧。

“沧桑看云”专栏开设了三年。三年，仿佛转眼之间就成了过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许多事情，尚未来得及细端详细细品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三年“沧桑看云”，三年心绪茫茫。

在这些“沧桑看云”文章陆续刊发时，不少朋友曾建议我不妨将每篇所写的话题进一步展开，甚至说，每个被写到的文化人物，都可以加以扩充写成一本书。对于我来说，这当然是很有诱惑的一件事情。但却又未必现实。从时间、精力、能力来说，我都不可能将所涉及到的人物的命运展开描写。

不过，朋友的建议启发了我。我想我可以有选择地将曾经写过的文化人物或者历史现象，按照一套书系的规模陆续结集出版。或者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或者是对某一历史现象、文化人物的思考与描述。譬如关于沈从文、关于周扬、关于“三家村”、关于红卫兵现象等等。

“沧桑看云书系”，基本上属于个人作品系列。但除了

我个人的作品外，有时根据实际情况，也编选不同作者围绕某一主题所撰写的文章。另外，在每种书中，我还将或多或少地附录一部分我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过的重要史料。我觉得，在今天，除了人们的思考之外，历史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其实同样具备思想的价值。史料并不总是冷冰冰的，枯燥乏味的，在一个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下，它们完全可以变得生动，变得热烈。同时，它们还可以使读者在参阅史料过程中，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这便是我编撰这套“沧桑看云书系”的初衷。

在结束“沧桑看云”专栏的时候，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岁月仍在流逝。流逝之中，今天变为昨天，明天变为今天。今天明天急匆匆变为无边无际的沧桑。

明天的我还会是今天的我吗？

明天的我还会如同今天一样凝望历史天幕上流动着的云吗？”

我希望，“沧桑看云书系”，对于自己，将是回望历史的最好延续。

1997年4月17日，北京

目 录

李 辉 《沧桑看云书系》总序	(1)
----------------------	-----

感受周扬

摇荡的秋千	(3)
往事已然苍老?	(13)

是是非非说周扬

与夏衍谈周扬	(33)
与名乙谈周扬	(45)
与于伶谈周扬	(47)
与萧乾谈周扬	(49)
与吴祖光谈周扬	(54)
与张光年谈周扬	(57)



与林默涵谈周扬	(78)
与李之琰谈周扬	(85)
与梅志谈周扬	(91)
与贾植芳谈周扬	(98)
与陈明谈周扬	(102)
与丁一岚谈周扬	(110)
与温济泽谈周扬	(117)
与王力谈周扬	(123)
与骆文谈周扬	(127)
与曾卓谈周扬	(131)
与李纳谈周扬	(137)
与袁鹰谈周扬	(144)
与王若水谈周扬	(156)
与唐达成谈周扬	(165)
与龚育之谈周扬	(179)
与蓝翎谈周扬	(194)
与露菲谈周扬	(199)
与艾若谈周扬	(203)
与周迈谈周扬	(213)

他们笔下的周扬

李之琰 不该发生的故事	(233)
于光远 周扬和我	(252)
王 蒙 周扬的目光	(283)



立此存照

姚文元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293)
李 辉 编后记	(330)

感 受 周 扬

摇荡的秋千

关于周扬的随想

1989年9月5日,是周扬的追悼会。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同一个人默哀,虽然各自心情不同。在我的有限经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人的追悼会,能像他的追悼会这样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同时负载着众多难以解析的矛盾。

就政治规格而言,追悼会的重要性已达到一个文化人所能获得的极致;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倘若死者灵魂有知,不知会是怎样感觉?政治上的重要性和文化上的魅力,不就是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吗?两者在他死后,居然同时来到灵前。

然而,当伫立在飘荡的挽联面前,我又感觉到这突然而至的荣光,却隐含着几丝悲凉。因为对于周扬来说,这荣光的代价

是人生走至终点时最后的痛苦、寂寞、苦闷乃至精神死亡。同时,它的降临,又是因一个巨大的历史变故而促成。就是那些纷沓而至的文化人,也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善良的宽容,他们不再苛求死者,也不回望昔日的风风雨雨,只是看重死者生前短暂却又难能可贵的心灵闪光。他们不是历史学者,不需要冷静和严厉,不需要去对历史人物做判断。

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追悼会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和兼容性,对于周扬的一生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可以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他人生的双重意义,即: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两者深藏于他的内心,决定着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它们天生地纠缠在一起,生生灭灭,互消互长。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在仕途上,他仿佛坐在一个从未停止摇荡的秋千上面,荡来荡去,性格的悲剧也就因此而产生,因此而无法避免。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心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把周扬作为我未来笔下的一个传记人物去研究。然而,几年过去了,我采访了许多和他同时代的人,但是,关于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复杂他的难度,远远大于我以往所描述过的任何人物,如巴金、萧乾、



胡风、沈从文等。他们也是有着复杂的精神世界的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常常能反映出内心的影子，他们的生存环境，往往容易捕捉和理解。周扬却不然，他留给我们的诸多公文和报告，很难让人能从中窥探到他内心的变化。实际上，在延安之后的许多时间里，他的自我已经消失在报告的后面，人们只能从历史风云的变化中看出他自己生活的蛛丝马迹。

虽然如此，我仍然感受到这个历史人物对我的诱惑。他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对他的悲剧的解剖，其意义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所无法取代的。不仅仅他，20 世纪的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被认真地客观地描述。而对他们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这个即将结束的世纪的认识，同时，也就会大大加深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认识（例如，胡乔木就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特殊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至少不亚于周扬）。

因此，最终能否写出一本周扬的传记，我依然没有把握，但是，作为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人物，他不会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仕途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度，对于个人总是有一种消融性。当醉心于理想而投身于仕途之后，他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己，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一定都如此，尚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

在政治家中，毛泽东也许是个例外。在我看来，他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他没有因政治而压抑自我，没有让个性消融在革命之中，相反，他的个性在最大限度上决定了革命，决定了政治的推进。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在他的照射下，所有崇拜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我置放到微不足道的位置。随他思考而思考，随他呼吸而呼吸。

周扬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仕途，是与对毛泽东的崇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上海到达延安后，与鲁迅的矛盾，可以说一度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周扬身上。然而，随着“鲁艺”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的上升，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周扬一下子摆脱了困境，从而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诠释者，这就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的基础。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一方面高度评价鲁迅，一方面又能信任曾与鲁迅格格不入的周扬，而不是重用与鲁迅保持友好关系的冯雪峰，这的确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兴趣，还是周扬的个性表现？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延安对于周扬是人生的最主要的转折点。一个崭新意义的周扬，一个在仕途上昂首前进的周扬，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人们的记忆里，30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年轻周扬，潇洒倜傥，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他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他投身革命，同时也是文艺家中的一员，对艺术有见解和感悟。这时的他，自由地挥洒着个性，让人感到亲切、可爱。

当几年后国统区的朋友重新见到他时，发现他的性格已不同于从前。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谈笑风生，而是不苟言笑。过去本来能够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却感到了他的陌生。到1949年之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他是文艺界领导，却很少参加文艺家的自由聚会，他是在主席台上在报告中在报纸上，同大家见面。有的人甚至说，他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人们尊敬他，敬畏他，却没有了亲切。



不知道周扬本人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变化，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向他暗示过这种变化，不管怎么说，他已不是单

纯意义上的文化人,而是仕途上的文化人。矛盾由此而产生。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就在这样的矛盾现实中开始塑造新的周扬。

应该看到,周扬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对艺术有独到见解、对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传统有一定了解的文人,他对文化建设有着较为积极的认识,并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还是愿意根据自己的认识,在最大限度上做一些具有个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在1949年之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一开始总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革”,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的受冲击者之一。

在1963年12月9日做出的关于文艺的批示中,毛泽东说过:“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不仅如此,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不止一次批评过周扬在政治上不开展,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无力。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看来,周扬身上依然残存着对革命有害的东西。1965年,在决定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几个周扬的老友时,毛泽东就曾亲自找周扬谈话,说过:你恐怕下不了手吧?

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受到过批评而失去权力,相反,他能

借运动而增加他的影响力。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周扬想必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从许多因他而受到冤屈的人的角度考虑,更该注意的是他做出选择后是如何领导运动,自己的好恶如何决定了别人的命运。不管情愿与否,在谈论周扬时,这是永远无法回避的历史。舍此,就不能勾画完整的周扬。

历史环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相互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当人们审视一个历史人物时,常常会说“这是历史造成的”。的确,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历史环境而生存,但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时,需要的是冷静和客观,不能因此而忽略个人因素的作用,不能因为历史的悲剧而忽略不计个人的责任。

不同的人的回忆,展现出不同的周扬,或者被看作“天使”,或者被视为“魔鬼”,反差甚远。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周扬。在历次运动中,他的矛盾表现在于,一方面他还是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而且运动过后尽量做一些弥补。但同时,宗派情绪或者其它原因,又使他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些人,把一些人推到逆境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虽然后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集团”并非他自己所为,甚至自己也没有料到。但种种迹象表明,正是他促成了这一历史公案的发生。而且,可以这么认为,当时他并不会因为胡风的人狱而感到十分内疚。还有丁玲、冯雪峰的冤案,他个人的好恶,显然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人回忆到,1957年当大会批判冯雪峰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是以轻蔑的目光打量着冯雪峰。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时刻,他不再会有内心的矛盾,也没有丝毫的徘徊。在研究周扬以及类似的历史人物时,对于这样的史实,是无须隐晦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有机会多次在公共场合见

